

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十二）

四十年代方型刊物代表作家——王小逸

附 陈亮评传及代表作

丛书主编 范伯群

南京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十二）

四十年代的方型刊物代表作家——王小逸

附 陈亮评传及代表作

南京出版社

丛书主编 范伯群
本册编校 吴培华

(苏)新登

凡 例

一、本丛书为中国近现代著名通俗作家评传及精彩代表作·的配套工程。新文学兴起以来，对通俗作家及其作品声讨有余，剖析不足。作家生平传记资料频于湮没，作品残损散失，久不重版，无法作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丛书既为作家生平搜觅保存史料，予以评价；又附录作家的代表作，以飨读者。

二、本丛书第一辑为十二分册，共四十四篇评传，介绍四十六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每册由一位通俗文学大作家“统率”，推出同类或相近的几位作家，结集为一册。如武侠类推平江不肖生挂帅，侦探类以程小青主干，社会类由李涵秋牵头，言情类追溯徐枕亚为开创。其他尚有宫闱类、演义类、帮会类、滑稽类、幽默类等等。凡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各大类题材均有所反映，对狭邪、科幻、问题小说等分支亦有所涉猎，尽可能做到体现近现代通俗文学整体风貌。

三、在语言媒体方面，尽量选择白话文体的作品。有少数作者（如徐枕亚）主要代表作均为文言文文体，无法回避，当压缩到最低限度。

四、为顾及丛书篇幅容量，以选取作家的中、短篇代表作为主，也选了少数长篇，基本上不采用节选方式。确实因某一作品全文篇幅太巨，不选不足以代表作家风格者，则尽量选择

可独立自成首尾之片段，并加编者按语，予以说明。

五、本丛书所附的作家代表作，均注明出处、年月、版本，以便查对；评传中的引文来源，皆用“页下注”加以说明。

六、本丛书所附作品，均按当时原杂志及旧版本重印，除在校读时改正误植及讹错外，悉按原样。

七、近代文学中的曾朴、刘鹗、李伯元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孽海花》、《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版本甚多，易于查找。本丛书只撰评传，代表作列名而存目。

八、本丛书所选的四十六位作家仅为中国近现代著名通俗作家中之部分，其他主要作家的评传及代表作，有待于第二辑再行介绍。亟盼同行及读者对本辑的撰、选、编提出宝贵意见，俾能于第二辑中加以改进。

目 录

总序.....	范伯群 (1)
四十年代方型刊物代表作家	
——王小逸评传.....	刘祥安 (11)
[附王小逸代表作]	
石榴红 (中篇)	(30)
写尽都市弄堂生态相	
——陈亮 (田舍郎) 评传	汤哲声 (172)
[附陈亮代表作]	
阴错阳差 (中篇)	(186)
后记.....	(265)

总 序

范伯群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界定

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文学的双翼，今后撰写的文学史应是双翼齐飞的文学史。

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接受一个观点：过去将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重要流派——鸳鸯蝴蝶—《礼拜六》派视为一股逆流，是“左”的思想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一种表现。

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进行一项工程：对通俗文学历史线索的梳理，首先应建筑在对通俗文学作品、作家、社团流派的广泛研究的基石之上。

一种共识，一个观点，一项正在进行的集体工程，使近现代文学研究者要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一界定。经我们初步探索，尝试表述如下：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

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大都会的兴建与近现代通俗热

随着工业的发达和现代化大都市的成型，在文学上的反应之一是，总会相伴出现一股现代通俗文学的滚滚热浪。欧亚若干国家的文学发展史可为这一历史必然提供佐证。在英国，和我国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格调相差无几的通俗小说，曾随工业革命的步幅加大而出版量猛增，并乘工业主义之帆传遍西欧和美国。在日本，随着东京和大阪等新兴都市的扩展，也出现了大量娱乐性的小说。这和清末民初，中国沿海的新兴都会上海，也由于工业生产的迅捷势头，应运而生地出现一个重要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是性质相类的。

为什么大都市的兴建与近现代通俗热的到来几乎会成为一个互为因果的规律，这可以从精神需求和物质后盾两方面去探究其中的内在联系。工业齿轮的运转加速和商业贸易的兴隆发达，使人际关系更为错综，社会活动更为频繁。在新兴都会中的居民普遍感到难于驾驭眼前瞬息万变的新局面，他们迫切需要扩大自己的信息量和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于是有了办报办刊的强烈需求，而这些具有醒目的都市性、商业性的报刊必然派生出娱乐性的副张，成为培育通俗文学的最佳苗圃与栽种园地。而要办面向广大市民的报刊，又必须以工业发达为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其中印刷机械化和造纸工业是必备的配套工艺。上海的印刷工业在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初的二十多年中，增长

了六倍之多。而据国外的资料显示，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廉价的新闻纸（白报纸）的出现，给出版业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出版商把近年来流行的书籍用平装本出版，每册售价仅十五美分，使原来“望书兴叹”的读者亦可问津。而在中国，李鸿章于1891年在上海创办伦章机械造纸厂，到1924年，全国有大型纸厂二十一家，其中十家均在上海及其附近市县。

工业化不仅为通俗文学的升温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也通俗文学“制造”读者群。沉滞的小农自然经济既为都市的工商业经济所取代，市民的生活节奏的频率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一下被机械的运转皮带绞得太紧的神经，这就需要娱乐和休息。而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创作宗旨，就是在满足读者的娱乐性、趣味性的前提下发挥“惩恶劝善”的惩戒劝俗效应。这种文学功能观是完全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精神的。作为新文学的大师的朱自清曾公允地说过：“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所谓‘三言二拍’……《拍案惊奇》重在‘奇’很显然。‘三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①

由此看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

① 朱自清：《论严肃》，载《中国作家》创刊号。

统神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都市通俗小说流派，这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代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交叠点的通俗文学的中坚力量。

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名称的由来

对这一派流的名称来历说法不一，但有据可考最早为其命名的，却是新文学为树立自己的权威，向当时庞然大物的该派争夺文学领地，对其进行声讨时的一种贬义代名词。1918年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同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他在举例时提到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①在1919年1月9日，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说：“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牋》、《香闺韵语》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等等。”^②接着在1919年2月2日，周作人在《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一文中说：“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③这就意味着清末民初，婚姻自主和闺阁教规的矛盾，已开始在此派的作品中提出来了。以上这些引文均是新文学革命初期为此派“命名”的实际过程，先认为是一种“体”，后来则确认其为“派”。

①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版。

② 钱玄同：《“黑幕”书》，载《新青年》六卷一号。

③ 见《每周评论》1919年2月2日。

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家不仅仅写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那些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都是他们擅胜的题材。因此，用成双成对的“鸳鸯蝴蝶”已无法概括该派的众多题材特色了。于是有人用该派最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为其代名词，取其休娱、消闲功能而命名为《礼拜六》派。

《礼拜六》杂志的《出版赘言》说，从礼拜一至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编者认为读小说乃最“省俭而安乐”的休息与自娱的方式：“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一篇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这样众多的题材放在《礼拜六》派的娱乐、趣味和消闲的框范中是完全可以容纳的。

这一流派在当年虽未发表宣言、章程或举行仪式，但这一流派的存在是肯定的。不过由于这些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文学界的指责和蔑视，使他们长期以来不愿承认自己是隶属于该流派的成员。突出的例子是包天笑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曾说：“近今还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目我为鸳鸯蝴蝶派……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于鸳鸯蝴蝶派。”^①周瘦鹃也否认自己是鸳蝴派，而承认自己是“十足十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②实际上，这两个名称所涵盖包罗的是同一批作者。我们之所以称他们是一个文学流派，是因为他们大致相同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情趣，并且占有共同的出版阵地，他们在1922年7—8月，曾分别成立过自己的社团——青社和星社。我们认为，如要在文学史上为这一流派取

① 包天笑：《我与鸳鸯蝴蝶派》，载香港《文汇报》1960年7月27日。

②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载《花前新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一学名，则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最妥帖。第一是说明这个流派以言情起家，逐步去广泛继承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众多题材，同时也借鉴外国的新样式（例如从公案小说发展为侦探小说），形成新的分支；第二是在科学性的前提下，参照约定俗成的历史因素，又顾及涵盖面，使流派的名称与内涵相一致，并经得起推敲；第三，这派的大多数作者笔下的题材是多样的，至少是“一专多能”的，我们没有必要再对一个流派，在名称上去作人为的割裂。问题倒在于我们不能再把这个名称看作是歧视性的贬称。过去给予该派作者的心理压力，应予消除；也应抹去在读者心目中的“逆流”的罪名。当我们再听到这一学名时，就象听到“文研会”、“创造社”、“新月派”、“七月派”一样自然，作为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可以分析、却不容歧视的文学流派，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多视角地考察通俗文学的实际价值

对一般读者而言，当然要求作品有可读性，故事有趣而引人入胜，在娱乐休憩中潜移默化地得到关于传统美德的熏陶。近现代通俗文学中的上乘之作是能满足读者此类要求的。因此该派在当年虽屡遭新文学界的挞伐，但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可是对一个文学流派来说，仅仅求助于民众自发的拥戴是不够的。这种爱护是感人的，但却是默默的。作为一个流派，要有一支理论队伍去研究自我，对自己要有恰如其分的、令人信服的、难于驳诘的自我评价与估量。在这方面，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它缺乏起码的理论自卫力量。它常常只能站在被告席上，无言地听原告历数其“罪状”。

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文学史研究者开始将该派作为一个有特色的通俗文学流派，把它放到学术领域中去加以考察和进行研究，从各个不同视角对其价值作了初步剖析。

从社会学的视角去阅读这派的小说，我们能看到一幅清末民初社会机体急速变革的图象：旧的机体正在衰朽，新的线路正在改道和敷设。李涵秋的《广陵潮》写出了自鸦片战争，历经上书变法、百日维新、武昌起义、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直至“五四”前夕抵制日货的生活画面。张恨水在1946年为重版的《广陵潮》作序时说：“我们若肯研究三十年前的社会，在这里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材料。”

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窥探，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民俗沿革的瑰宝，特别是欧风美雨东袭与固有传统习俗相对抗相杂交时，民俗的细致变异过程。这在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网珠生（平襟亚）的《人海潮》和毕倚虹的《人间地狱》中均有出色描绘。夏济安曾赞叹：“最近看了《歇浦潮》，认为‘美不胜收’；又看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写篇文章，讨论那些上海小说。”^①

学者们都逐渐体认到，凡是从文化学的视角去透视通俗文学，就会发现它是一座蕴藏量丰饶的高品位的富矿。据了解，美国学者过去也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仅是一堆文学垃圾而已。但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兴起。他们开始从通俗文学中汲取养料，逐渐感知通俗文学能历史地反映某一时间长链中老百姓的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苏珊·埃勒里·格林在

① 《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载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美国通俗文化简史》中说：“这些畅销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① 同样，我们也可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作品中看到清末民初这一过渡时期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人情世态之流变。

从文学艺术的视角去测定该派作品艺术的含金量是我们今天应该着手的工作。夏济安有一种意见：“清末小说和民国的《礼拜六》派小说艺术成就可能比新小说高，可惜不被人注意”。^② 这个“可能”有几许科学性，是正数抑或负数，有待于对这派艺术的含金量作精密的定性定量分析。但我们应该为它摘掉过去先验地戴在头上的“庸俗文学”的帽子，然后再评头品足。

我们还可列举通俗文学的其他的多种价值。如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衡量，它提供了若干中外“商战”的史料和中国近现代经济结构的变性图象；从地域史的视角去追溯，我们会感到，要写上海、北京、天津、苏州、杭州等名城地方史，撰述中国之租界史，不去阅读通俗文学，就会缺乏起码的感性知识。根据上述的多种价值和探讨，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俗文学的功能是可以和纯文学发挥互补作用的。

我们面对的是一块过去未予重视，又亟待开垦的无垠的处女地，至少也是休耕地。从一种共识，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希望这项工程在破土动工后，大厦早日建成。这就有待于我们对通俗作家和作品进行认真的研究。为此，我们编撰了这套通俗

① 苏珊·埃勒里·格林：《畅销书》，载《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载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作家评传丛书，算是我们课题组为这一工程尽一分微力，添砖加瓦。丛书第一辑共十二分册，收入四十六位作家的评传。对其他著名的通俗作家的研究，则希望在以后的第二辑中去展现。为取雅俗共赏，全面介绍，我们在提供作家生平及创作道路之外，也配套编选这些作家的中、短篇代表作，使评传与作品并存共览，为读者提供目前已不易觅到的该派作家的“精神样品”。由于这些作家中的绝大多数皆是蹲在被遗忘的角落里，长期“冻结”，他们的不少生平资料已被湮没，若干作品因搜罗不及而暂付阙如。我们深感自己的孤陋寡闻，切望得到学者、读者、知情人的不吝赐教。随着资料的陆续“出土”，研究的日益精深，双翼展翅的新的文学史也可期待有日了。

四十年代方型刊物代表作家

——王小逸评传

刘祥安

(一)

王小逸，江苏省南汇县川沙镇人（今属上海市），1895年10月生。王小逸名次鑫、鑫，字镕生、雄声、小逸。多笔名，举其要者，有“捉刀人”、“春水生”、“王微波”、“爱去先生”、“何家支”、“乙未生”、“石长宁”、“醉沙”等。

王小逸的小说创作兴趣，始于学生时代。1912年，王小逸是上海东亚法科大学法科的学生。这年冬天，他的一位同姓同班同学的恋爱故事，激发了他写作小说的兴趣。原来，先是这位同学对学校附近的一位裴姑娘害了单相思，后来竟痴想成病，有点神经兮兮的，唤着所恋女子的名字姊姊妹妹地乱嚷，闹得全校、一条街都知道了。幸好时值辛亥革命胜利不久，民国处处颇有点“维新”的意思，所以这件事不但没有遭到校方的干涉，而且感动了裴姓家长，允许将女儿嫁给王某。学校复将礼堂借予王某行文明婚礼，这有情人竟成眷属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这似乎只有浪漫主义作家才编得出的罗曼史给王小逸留下